

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选编

古汉语语法论集

郭锡良 主编



语文出版社

● 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选编

主编：郭锡良

古汉语语法论集

编委：（加）蒲立本 （法）贝罗贝 （挪）何莫邪 （日）大西克也
何乐士 王 宁 蒋绍愚 宋绍年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汉语语法论集/郭锡良主编.-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8.6

ISBN 7-80126-315-4/H·70

I. 古… II. 郭… III. 汉语-语法-古代-文集
IV. H1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159 号

GUHANYU YUFA LUNJI

古汉语语法论集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4.375 印张 612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6.6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1994年2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会上决定在中国召开第二届会议。我代表与会的中国学者表了态,承诺尽力筹备。回国后,我们经过多方努力,得到了国家教委、北京大学的支持和关注,又得到了高校古委会、语文出版社的资助,终于在1996年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会议。根据大家的意见,这次会议扩大了研讨范围,把各个时代的古汉语语法问题都包括在内,因此叫做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保存历史文献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积累了三千多年的用汉语写成的浩如烟海的典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传世珍宝,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要理解这些文献典籍,就必须通晓古代汉语。同时,要真正通晓12亿中国人民正在使用的现代汉语,也必须懂得古汉语。因此,古代汉语的研究,历来都受到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古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20世纪古汉语研究的新分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80年代以来,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在古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此,召开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交流研究成果,探讨研究方法,符合国内外广大古汉语语法研究者的心愿,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正因为如此,这次会议通知发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要求与会,会议规模不得不由原定的五十人扩大到近百人。与会学者认真撰写了论文,很多人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带到了会上。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85篇,其中大会宣读7篇,分组会宣读67篇。论文涉

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从时代来说,上起殷商,下迄元明。从内容来说,有理论方法的探讨,有词法、句法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有断代语法、专书语法的研究,还有虚词以及句法结构的性质、功能、形式的探索。会议就十分广泛的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讨,大家畅所欲言,在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中,问题明朗了,认识深化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学术空气浓,论文质量高,确实起到了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

为了反映会议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经过协商,在大会闭幕前,成立了论文编辑委员会。为了争取多刊登一些论文,编委会对每篇论文的字数作了一些规定,请论文过长的作者压缩字数,会后尽快将论文改好寄来。绝大多数的作者都非常合作,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所有论文至少都经过两位编委看过,提出意见,然后由主编通审,并经在北京的编委开会讨论决定,选编了56篇论文,定名为《古汉语语法论集》。入选论文除少数几篇超过规定字数的以外,一般很少改动。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未能将所有论文收入论文集,处理难免有所不当,尚希作者见谅。这本论文集无论从作者的阵容、论文的质量,还是从论文覆盖的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来说,无疑都是空前的,说它展示了当前各国学者研究古汉语语法的方法和水平,反映了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这次会议的召开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必将对我国古汉语语法研究以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交流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教委、高校古委会、语文出版社对会议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多方的支持和赞助;论文集的全体编委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责任编辑王永强为论文集的出版竭尽全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郭锡良 1997年6月于畅春园

目 录

1. 古汉语语法研究三议 许威汉 (1)
2. 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 梅祖麟 (15)
3. 汉语的语法和词汇：一种动态的探讨
..... 左格拉夫 (I. T. Zograph) (31)
4. 中国古代语法分析方法研究与探索 孙良明 (40)
5. 论《春秋公羊传》的语法观 严修 (56)
6. 从《马氏文通》对经生家的批评看语法学与
训诂学的区别 方平权 (73)
7. 古汉语语法研究与语料的鉴别 王魁伟 (82)

8. 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郭锡良 (88)
9. “于(於)”系处所介词的历史演变 赵大明 (103)
10. 介词“于”的未完成用法 杉田泰史 (123)
11. 并列连词“及”“与”在出土文献中的分布
及上古汉语方言语法 大西克也 (130)
12. 中山王陵三器铭文中“佳”与“也”的比较 ... 高岛谦一 (144)
13. 论“之”的语法性质 敖镜浩 (149)
14. 先秦汉语副词分类 李佐丰 (161)
15. 否定副词“非”及其否定的结构形式 周生亚 (171)
16. 《孟子》的副词 李杰群 (188)
17. 程度副词“颇”的语义特点 洪成玉 (202)
18. 古代汉语重叠词的内部构造 孙景涛 (215)

19. 《周易》“~若(如)”结构考…………… 裘燮君 (230)
20. 由虚字的用法论周原甲骨断代 …………… 朱歧祥 (244)
21. 古代汉语代词的形态 …… 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264)
22. 《墨子》称代系统论隅…………… 董琨 (271)
23. 先秦助动词“得”字用法的考察 …………… 刘利 (283)
24. 论古汉语记时词语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 王海棣 (293)
25. 甲骨刻辞兼类词研究 …………… 向光忠 (300)
26. 词类活用和名词“意动用法” …………… 史震己 (313)
27. 上古汉语某些名词活用为动词质疑 …………… 陈涛 (324)
28. 古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 …………… 宋绍年 (331)
29. 《孟子》动词的活用与兼类…………… 崔立斌 (341)
30. 关于词类活用的两个问题 …………… 张联荣 (359)
31. 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 …………… 洪波 (370)
32.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概说…………… 殷国光 (380)
33. 古代汉语中的“动”之“名”结构… 贝罗贝(Alain Peyraube)(392)
34. 古汉语“动+之+名”式的结构分析 …………… 丁桢蘂 (407)
35. 先秦书面语的双宾语动词类型 …………… 廖振佑 (417)
36. 先秦双宾语结构考察 …………… 刘宋川 (431)
37. “主·之·谓”结构的“之”在语流中的作用及
该结构产生和衰落的原因 …………… 黄丽丽 (455)
38. 《左传》中的组合歧义及几种歧义格式…………… 孙力平 (470)
39. 《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 …………… 何乐士 (487)
40. 试论先秦汉语补语与动词的类
——兼谈“动补句”的句法句型特点 …………… 陈克炯 (503)
41. 动词“为”的句法语意双边研究 …………… 高斯曼 (520)
42. “为”字的性质与“为”字式…………… 姚振武 (536)

43. 上古汉语中的工具主语句 谢质彬 (555)
44. 汉语反复问句的历史发展 刘子瑜 (566)
45. 《左传》假设复句研究 白兆麟 (583)
46. 殷墟甲骨文句类问题研究 张玉金 (596)

47. 唐五代语气词的更迭 孙锡信 (609)
48. 再论助词“着”的用法及其来源 孙朝奋 (626)
49. 后置词“行”考辨 江蓝生 (642)
50. 从几个例词看唐代动量词的发展 王绍新 (657)
51. 《祖堂集》“去”和“去也”方言证 刘勋宁 (674)
52. 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 蒋绍愚 (683)

53. 《九歌》中的声气句读与文法句读 王大年 (697)
54. 韩愈不严守文言语法析 许嘉璐 (710)
55. 上古汉语“哭”“泣”辨 ...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723)
56. 《左传》“军师旅兵”辨 高守纲 (735)

附录:

1. 开幕辞(郭锡良) (753)
2. 闭幕辞(蒋绍愚) (755)
3. 高思曼教授来函 (756)
4. 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会议议程表 (757)
5. 分组会日程表 (759)
6. 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纪要(孙玉文、杨荣祥)..... (764)
7. 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筹备组名单 (770)
8. 大会秘书组名单 (770)

古汉语语法研究三议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一 语法研究的四个平面

近年语法研究注意到三个不同平面，即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实物的关系（能指所指）、符号与人（使用者）的关系。语法学者认为汉语句法本身是不完备的、不自足的。自然语句是由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因素交织而成的，用狭义的句法难以分析包含丰富的句法、语义、语用因素的句子。对一个句子进行分析，应首先区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现象，然后才能对它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现象对当代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语法研究方法上的新进展，有助于语法学科的精密化、系统化和实用化。但这样研究语法还仅仅是开始。如何在语法分析中，特别是在汉语的语法分析中全面地、系统地把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既界线分明地区别开来，又互相兼顾地结合起来，这是摆在语法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值得进行深入探索的。”（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诚如范晓所说，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是新课题，目前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值得深入探讨，区别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综合观察分析句法、语义、语用三个

平面因素相交织，是相当复杂的课题。句法研究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认识尚很不一致。语义研究尚是语言理论中薄弱环节，结构语用学又不能同交际语用学截然分离，就都是面临的复杂问题。别的暂且不说，单要突破语义学这一学科内核，就先要解决语义学自身四个平面问题：第一，要抽取语义的核心内容；第二，要剖析语言结构表达意义的方式方法；第三，要综合语言的环境意义；第四，要揭示语义学与别的各有关学科的联系与互相作用（因为语义学被认为是语言学和哲学的桥梁，语义问题是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信息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语义学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尚待讨论）。又，语用学的范围可大可小，广义语用学研究一切语境，狭义语用学只研究语言中跟使用者相关的成分。语用学研究也要解决自身四个问题：第一，指别（如指代词，时态等）；第二，会话含义及分析；第三，预设；第四，语言行为。仅语义语用问题尚且如此复杂，其他句法问题的复杂性更不待言。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语言的深层探讨。学术的发展，使学科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既高度综合，又纵横交错，派生出许许多多新学科，各新学科又从理论上不断综合，促使着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的提出，正是对客观规律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还不是终结。

对客观规律认识既是不深化的，作为一种主张，向来都有补正发展余地，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自然也不例外。从汉语事实，特别是从古汉语事实看，总的说来，语法研究似应注意四个平面，这四个平面就是句法、语义、语用加上语音。离开语音，语法研究就易受局限，即便不是停留在不同学派不同方法的借用和更换，符号、框架的设计和创新，对古汉语实际的研究也总难以入木三分。语音是语言的内部形式，不视为“平面”，但符号是传递信息的中介，语法研究不能完全撇开语音。况且符号学还是

发展中的科学，自身有待完善，它的科学定义，它在语言学科中的施用，也有待进一步取得共识。有鉴于此，姑且不为符号学所胶固，权视为“平面”。如觉有碍逻辑层次的论析，四者不相提并论，另立名称也无妨，但反正不能没有语音。陆宗达、俞敏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上)第二章专谈语音，第三章“语法的材料跟部门”结合语音谈，可谓识见高明。

理论问题暂不多谈，还是着眼观察汉语语法中的语音因素的实际情况。

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墨翟，不仅最早分析虚词的语法作用，说“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方然亦且，若名者也”(《经说》上第四十二)，而且最早注意到语词和句子的语音因素。他说“声出口，俱有名”，“言由名致”(同上)，指出语音和意义的关系，表明一个句子用语音来表达事物是集合名而形成的。墨子的语言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被人发现和重视，更没有得到后人的深究发展，而且人们似乎以为重视语言的声音因素是汉代刘熙及以后的清代乾嘉学者的一大发明(当然，清代学者对音理的卓识远非刘熙所能比拟)，“声音是语言物质外壳”是现代的一大发现，实未尽然。正因为语音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又有其他有关的局限，语法研究中也就没有语音因素的一席之地，语法研究的发展便不免受到影响。今天自然不应再囿于成见了。语音因素应是语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这可用事实来展示。

(一) 有关语法形态现象

语法形态表现在声调变化上不乏其例。先秦汉魏晋六朝以来都有改变读音区别词义和语法作用的事实。《诗大序》：“风，风也。”前一个“风”字是诗的一种名称，《诗大序》的作者认为“风雅颂”的“风”作为“教化”“风化”(“上化下曰风”)解释的时候，念作平声，而作为“风刺上”(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这个风字后来写成“讽”)的意思，念作去声，词汇意义不同，

语法作用也不同，意义作用不同靠声调不同来显示。在这里语法的形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以去声和别的声调对立为标志。这种区别性的对立来自语言自身，是语言运用所使然，不是人为的，不然的话，“风，风也”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了。其他像《周易·序卦》“蒙（卦名）者蒙（蒙昧）也”；《孟子·滕文公上》“彻（周代税赋的名称）者彻（取的意思）也”，也莫不如此。刘熙《释名》的“传，传也”，“观，观也”，也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有人解释为“同字为训”，有人视为“声训”，只就其形音表现而言，实质上是以词的不同读音表示不同意义和作用。产生不同意义和作用是由于词义引申的结果，所以使用同字相释，循音求义，由本义明其派生意义。郑玄注《礼记》《周礼》《仪礼》，高诱注《吕览》和《淮南子》，应劭著《汉书集解音义》等，一字两读的很多。晋代葛洪的《要用字苑》和徐邈的《毛诗音》《左传音》也多有实例。南北朝颜之推《家训·音辞篇》说“好”有“呼号切”一音，“恶”有“乌故切”一音，即见于晋人葛洪、徐邈书。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出乃集历来音注之大成。这种现象，有人叫它“四声别义”，进而认为“起于六朝经师”，看成是人为的认定，颇与事实不符。若果真是六朝经师所始为，那么早在先秦出现的“风，风也”之类将如何合理认识呢？经师的解释方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力求内发其规律性联系的，外加的人为限制势必难以反映语言事实，也不可能为历来人们广泛接受和应用。

声调变化引起词性变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呢？王力指出：“凡名词和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则动词念去声；凡动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总之，转化出来的一般都变为去声。”（《汉语史稿》中册 213 页）前边举了名词转化为动词读去声的例子。形容词“美”读上声，转化为“爱好”读去声，则是形容词转化为动词的例子。汉语的形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王力在《汉语史

稿》中册 213—217 页举了四十来个例子，这儿不一一转引了。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度里，语音因素是语法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用汉字来记录不同语言类型的汉语里，语音因素常被忽略了，因而语法学在中国语文学中的地位也不一样。诚如吕叔湘所说：“西方语文学除考订语词意义之外，特别重视语词的形态变化，因为语句的理解以它为关键。所以他们很早就产生了语法学。上古时代的汉语是否有某种形态变化，现在还没有定论，至少是不表现在汉字的字形上。积字成句，理解不难，因而语法在中国语文学中没有形成一个科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2 页）汉字是语素文字，本身不标音，形态变化不表现在汉字上，但是形态变化却另从声调转变上寻找出路了。这种出路当然是有局限的，而且形态变化不是多渠道的，这归根结蒂，还是记录孤立语的汉字所使然。然而以声调转变表示形态变化毕竟不应熟视无睹。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不同声调表示不同意义和作用，这是表示形态变化的可能性。语言中有必要用不同声调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作用，事实上又有表示形态变化的必要性。有此可能，又有此必要，作为独特的形态标志的声调语音形式，便随之产生了。据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发端自上古，广泛反映于“中古汉语的形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王力《汉语史稿》中册 213 页）。

（二）有关构词法现象

“汉语双音词的发展，是汉语语法发展的一大特点。”（《王力文集·第十一卷》2 页）汉语双音词的构成（包括单纯词和合成词）所展示的语音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语音因素给语法发展以积极影响。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有人曾从词汇学角度提出构词的语音因素和作用，见于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年），80 年代任学良《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专章叙述“语音学造词法”，从“取声命名”“拟声”

“双声”“叠韵”“合音”等等方面作了剖析。郭绍虞则结合文学的评论作了若干申述。但是总的说来，讲语法的人，对构词中的语音因素的重视还是不多见的。我国古代语文学没有语法科目，但有语法的研究。古人的语法研究既跟训诂学相结合，又跟修辞学相联系，所谓“语音学构词法”，就是大都跟修辞学相联系的。别的暂且不说，仅以“双声式构词”“叠韵式构词”而论，就是同修辞相联系的。

前人对语音的运用，很早表现在双声叠韵构词上。为什么要用双声叠韵构词呢？因为双声叠韵具有听觉上的美感，听起来和谐悦耳。这也就是说，双声叠韵由于音节中某一个构成要素（声母或韵母）有规律地重复出现，造成了音素的回旋，因而听起来具有美感。比如：

流利（双声）——声母 l 隔了一定时段（时间段落）之后重复出现。

烂漫（叠韵）——韵母 an 隔了一定时段之后重复出现。这种具有音乐美的双声词和叠韵词的构成，是最符合汉语音节美结构的特点（偶数，匀称），为汉族人民所喜爱，也适应修辞上的要求的。汉语的许多语词，就是借助双声叠韵构成的，念起来无不琅琅上口，增添了语言音节美。听起来人们都有共同的感受。其中双声词和叠韵词相比，叠韵词韵母部分比较响亮，所以叠韵词比双声词更多。人们用双声词、叠韵词构成成语如琳琅满目、汹涌澎湃之类，形成的节拍群亦显和谐悦耳。总之，利用语音因素的某种配合关系来构词，是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这方面，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大顾及，未加正视。李新魁《古音概说》第七章“古音的运用”中倒有所涉及。

（三）有关轻声现象

随着语言的发展，轻声不断产生，它既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又使汉语语音增加了新的色彩，同时还使新的语法因素从语音上

表现出来。比如“妻子”的“子”念轻声与否，有着不同的语法作用：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这种词与词组的区别，与轻声的辨读至关重要。又如“图书”的“书”不读轻声是概括图画书籍的意思，“书”读轻声则是印章的同义词（“图书印”的略说）。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基础，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发展来的，现代汉语的许多复音节词，原是古代汉语的沿用。在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如果念轻声，轻声多半在第二个音节上，三音节词，如果念轻声，轻声多半在中间一个音节上；双音节词前头加一个音节构成三音节词，就按双音节原来的轻声念。除此之外，什么地方要读轻声，有一些规则，即语气词、前后缀及形尾、助词、量词、方位词、趋向动词、动词重叠、动词或形容词相叠表疑问、代词充当宾语等等一般都念轻声。这种种新的语法因素从语音上表现出来，在语法研究中能不过问吗？认识和说解语言现象，重在具有“区别”的眼光和能力，区别汉语轻声与否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作用应是汉语研究的新取向。早在 50 年代，《中国语文》杂志社已编有《北京话轻声词汇》（中华书局，1957 年），对今后的古今汉语语法研究也都不无参考价值。

（四）有关虚词现象

古汉语虚词与语音因素关系的密切性早已存在于语言史实中，但是对它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举了 16 个否定词：“莫、蔑、曼、无、毋、亡、未、末、靡、罔、勿（上古属明母字）、否、不、匪、弗、非（上古属帮母字）”，全部都是唇音字，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为什么呢？还有王力提到常见虚词集中在“鱼、之、歌”部，其次是“寒”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些规律性内容都有待作深广度的申论。还有虚词运用如“也”字，明清的钱福、王阳明、王夫之、刘大櫆，近现代的林琴南、臧克家等等，在他们的文论中常有所提及，但总嫌言不要其中，即便有人指出它“带声拖出”示“悠扬之余韵”的“结构

音节感”，却未见具体开掘。

凡此种种，集中到一点，汉语语法研究必须重视语音平面，它和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同样重要。同时也必须指出：如若不这样认同，立足于句法、语音两个平面（兼参语义、语用），亦非断然不可。这方面的深入阐释，自可泼墨如云，暂且从略。

二 语法研究要与词汇研究相照应

语言三要素中，“从中国语言学发展史来看，词汇学创始得最早”（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就语言学科的成长的时间来说，科学的词汇学的产生是比较晚的”（周祖谟《词汇和词汇学》）。由于科学的词汇学产生比较晚，我们对词汇方面的许多现象的认识还相当不够。对词汇现象的认识，往往有助于对语法现象的认识，而且彼此相辅相成。词汇研究与语法研究有所照应，有利于拓展视野，深入开掘，揭示规律，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全面发展。这儿暂且从几个侧面透视吧。

（一）从词义与语法成分往往同步发展情况看

我们回顾历史，仅仅从一些句法现象着眼，也不难窥见词汇语法交织网络之大略。比如汉代状语比先秦发达，这就跟词汇系统中用作状语的副词日益丰富有关；而这用作状语的副词往往是经过实词词义的历史演变而出现的。像“良”这个词的本义是“首领”，常用义是“善”，汉代引申为表程度的“甚”义，在句子中多用作副词状语。“良”词义引申与用作副词状语是同步的。又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前后状语和补语的分布格局日益趋向前多后少的变动，但也就在这南朝的齐代，“得”的词义逐渐完成了由实到虚的演变，这就出现了用结构助词“得”的使用频繁内容丰富多彩的补语，因而又使状语和补语的分布格局有了新

的调整，直到现代，有结构助词“得”的补语用得越来越灵活。“得”的实词虚化，对句法结构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二）从构词规则的增添与消失看

我们再从构词现象着眼，“船只、纸张、房间”这一类词的产生，是同词汇系统中量词的日益丰富有关。先秦名量词大多数是表度、量、衡单位的，数目不多，动量词还没有；到了魏晋南北朝，名量词先后增加到一、二百个，动量词从无到有，也产生近二十个。发展到后来，便产生了名词素接量词素构成的名词（如上例）。这是量词的发展促进了构词法的发展，量词的研究启示了对构词法的认识。还有“蝗虫”上古说成“虫蝗”，这种“以大冠小”的构词法的产生与消失，还得明其当时异族词汇语法背景在汉语词汇语法领域的反映（现在只能说“蝗虫”）。诚如吕叔湘所说，“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语文近著》14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而人文科学内涵宽泛丰富，形态多样，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那还得多角度多科性透视。

（三）从实词活用现象看

词汇语法是修辞的基础，有些修辞现象的研究和词汇、语法现象的研究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李白笔下有“东风又绿瀛洲草”句，丘为笔下有“春风何时至，又绿湖上山”句，王安石笔下有“春风又绿江南岸”句，李清照笔下有“暮天雁断，草绿阶前”句，蒋捷笔下有“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句，其中形容词“绿”活用为动词，化静态为动态，不仅具有动词的语法意义，而且也保留着形容性质状态的意味，易唤起人们一种具体、形象的联想。由此我们又不难发现词汇、语法、修辞三者的规律性联系。我们知道，作为一种语法现象的实词活用，以先秦为最盛，中古已趋稳定，但主要出于语词修辞要求的实词活用，中古以来仍频频在文人笔下出现。“绿”的使用便是一例。修辞学是研究如何有效运用语言——主要是语言中的词正确、鲜明、生动表达